

梁家文 编著

# 古代公关言语与谋略

岳麓書社

## 读 者 回 音

- 此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有适用性,还有可读性。它从故纸堆中钻出来,站到时代的前沿,从古中翻新,从旧中寻奇。可谓是公关的祖传法宝,竞争的难得参谋,决胜的锦囊妙计,古为今用的最新尝试。
- 学习此书,有助于提高公关言语技巧,增长公关谋略智慧,了解公关发展历史,丰富语言与文史知识。
- 读此书最深的感觉是:像在百花丛中游玩时见到了一朵雅致独特的奇花。带领我到了一片新的知识领域。

(以上是几位青年朋友的心得片段)

# 目 录

概 说 ..... (1)

**出言制胜篇** ..... (19)

善说(19) 武王伐纣动员令(22) 屈完迫使齐联军议和(27) 展喜犒劳齐军(30) 烛之武退秦师(33) 齐国佐舌战晋主帅(37) 越国求和策略(41) 墨子止楚攻宋(45) 苏代止赵王伐燕(48) 陈轸为齐说昭阳(50) 南辕北辙(52) 唐雎不辱使命(54) 鲁仲连义不帝秦(58) 晏子使楚(69) 吕相绝秦(71) 驹支不屈于晋(79)

**纵横捭阖篇** ..... (83)

陈轸说齐王联合拒秦(83) 苏秦从燕至赵始合从(86) 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94) 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97) 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102) 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107)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111) 毛遂自荐为赵合纵说楚王(117)

**酬酢应对篇** ..... (124)

楚成王以周礼享重耳(124) 秦伯以国君之礼享重耳

(128) 箕郑答晋文公问(133) 楚王问，伍举论台美(135)  
赵威后七问齐使者(142) 韩信拜将答刘邦(145) 隆中对  
策(150)

### 创业守成篇 ..... (156)

刘邦“入关告谕”(156) 刘恒“议佐百姓诏”(158) 陈平论宰相职责(160) 高泰谈治国之本(163) 唐太宗“以至诚治天下”(164) “创业”难，还是“守成”难(167)

### 荐贤用贤篇 ..... (170)

文公任贤与赵衰举贤(170) 蔡声子论楚材晋用(174) 祁奚荐贤(182) 祁黄羊可谓公矣(184) 祁奚请免叔向(186) 齐威王论国宝(190) 才行兼备(192) 所谓故国者(194) 先生王斗欲见齐宣王(196) 燕昭王求士(200) 刘邦“求贤诏”(206) 刘彻“下州郡求贤诏”(208) 小“九九”引来大贤才(209) 汉高祖与诸将论得天下(211) 晏子说国之“三不祥”(216)

### 商战决胜篇 ..... (219)

经商致富的鼻祖(219) 计然之计，富强之道(221)  
振兴商务，势在必行(223) 商战取胜种种对策(233)

<b>廉政除弊篇</b>	.....	(249)
“不知”与“四知”(249) “文臣不发钱，武臣不惜死” (251) 海瑞“禁餽送告示”(253) 黄体芳“请将外省陋规 名目分别裁定疏”(255)		
<b>内部调协篇</b>	.....	(264)
十七年听不到批评话(264) 虎听虎笑，狐听狐喜 (267) 惠王“兼听”，调解矛盾(269) 贯珠治妒的“药方” (273) 威子巧言救烛邹(275) 长孙皇后智救魏征(276) “将相和”的关键何在(278)		
<b>外部交通篇</b>	.....	(283)
寄语宣子减轻纳贡负担(283) 借“伯乐卖骏马” (286) 陈余“劝降书”(288) 汉文帝致函匈奴单于(290) 张骞出使西域(294) 诸葛亮巧用激将法(302) 邓芝巧说 孙权联蜀(307)		
<b>附录</b>	.....	(310)
苏秦列传(310) 张仪列传(325) 论我国公关言语艺 术的美学传统(345)		

# 概 说

随着改革开放宏图的设计与实施，八十年代起，神州大地上涌起了滚滚滔滔的公关热浪。

现在，公关事业方兴未艾。各企业、各公司（集团）的公关部，以公关命名的学校、专业、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招聘公关小姐、公关先生的广告，在报刊、电台、电视的栏目中随处可见。公共关系成了当今社会最吃香的职业！谁掌握“公关”这个法宝，能够灵活运用公关语言与谋略，创造性地运用公关策划手段，谁就能在竞争中获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什么是公共关系？很神秘吗？

一九七六年，美国的哈罗经查阅资料和征询有关权威人士的意见，发现解释公共关系的定义有472种之多。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它是一种管理职能。哈罗也持这种意见。参考美国人的解释和我国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似乎作如下的表述比较合适：

公共关系是一种通过传播与沟通来影响公众、谋求理解与合作、以塑造组织形象为目的独特的管理职能。它既是一种专门职业，也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

按照不同情况与水准，公共关系实务有自觉与不自觉、专门与兼及、系列与单一等差别。若按时间来划分，则有古代公共关系（准

公共关系)时期和现代公共关系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

公共关系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鲜的学问。说古老,我国公共关系活动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悠久;说新鲜,是“公关”的名词新鲜,直到党中央确定改革开放的方针后才提起它,才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兴趣。至今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对它不甚理解,甚至把它和走后门、谋私利的“拉关系”相提并论。其实“公共关系”与走后门“拉关系”的性质完全相反。公共关系是以树立组织良好形象为其宗旨,以谋求公众利益为活动的准则(或前提);而“拉关系”却是用不正当的手段为个人或少数人谋私利,是建立在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基础上,二者毫无相通之处。

## 二

了解了什么是公共关系,接着要明确公关语言在公共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公共关系结构,有公关主体(社会组织及其代表)、公关媒介(传播、沟通手段)和公关客体(公众,即公关对象)三个基本要素。公关语言在公共关系结构中,正是扮演着公关媒介信息载体的角色,起着传播信息、沟通主体与客体,从而实现公关目标的桥梁作用。按照公关语言的职能特点和传播信息的不同方式可分为两大类。语言形式包括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非语言形式包括情态语(如语调、重音感叹、哭笑声等副语言)、体态语(表情、手势、点头、摇头等五官及肢体动作),还有信号、符号、代码、实物展示、模型图表、人物表演等等。如果这几方面基本齐备,可称为完全公关语言形式,若缺少某些重要部分,则称为不完全公关语言形式。当然具体到某一项公关活动,不是所有的形式都用上,而根据情境和需要,侧重使用其中的几种。

公关语言，是公关主体在公关实务中为实现公关目标而对普通语言的具体运用及其成品。它是普通语言的一个分支。其语言形式（口语、书面语）是对普通语言的具体运用；其非语言形式则超出了普通语言的范围。公关语言除具有普通语言所具有的功能（交际工具）特性外，还明显地表现出以下特征：突出的双边性、明确的目的性、鲜明的针对性（选择性）、强烈的社会性（面向大众）、有效的服务性和表达与传播形式的多样性等等。它的主要职能是以得体的言语与非言语形式的巧妙结合，完成传播信息、促进理解、协调关系、扫除障碍、谋求合作、塑造组织形象的公关任务。

社会组织的代表——公关主体在公关实务中对普通语言和公关语言形式的具体运用及其成品称为公关言语。普通语言是属（大）概念，公关语言是种概念，公关言语是小概念，其个性特点和风格，因人（主体不同）而异。

从公共关系结构中知道，作为公关媒介之一的公关语言，它与公共关系结为一体、长伴长相依，须臾不可分，二者存在着相生相成的密切关系。公关语言随着公共关系的产生而产生，伴随公关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公共关系实务离不开公关语言，公关语言全是为了实现公关目标服务。

若要问我国古代存不存在公关语言，若是存在，那么它发生与发展的轨迹是怎样的，那就得先考察我国古代公共关系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三

有的学者对公共关系的起源、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作了有益的研究和探讨，但却否认公共关系在中国古代是客观存在。认为“它是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商品经济高

度发展的产物。”以此来观察、说明现代公共关系，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要问：在农业、畜牧业为主导、商品经济尚未高度发展的古代社会，公共关系是否也已发生和发展呢？就会有不同的回答了。有的学者从政治状况考虑问题，说“现代公共关系的兴起是民主政治取代专制政治的必然结果。”这也对，但从而推出：“封建社会的政治以专制政治为特征”，所以“根本不可能产生以‘真诚交往互惠互利’为基础的公共关系。”这就未免过于绝对化了。

现代公共关系作为新兴的管理职能，是从 20 世纪初的美国开始的。但是同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发生、发展的过程一样，公共关系也必然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现代的公共关系是从古代的公共关系（准公共关系或前公共关系）发展而来。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公共关系的术语和著作，但公关意识与实践活动却早已发生和发展着，不过是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罢了。

公共关系是一种管理职能，属于社会关系范畴，要断定它在我国古代是否已发生、发展，我们根据公共关系的结构要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一）以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集团及其代表机构（及其责任者）是否存在；（二）由生产、经营所形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活动的发展是否具备一定的条件；（三）具有公关特征，及其构成要素的公众交际活动是否发生与发展。根据这三点，应该说公共关系不仅在我国封建社会而且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就已经是客观存在。只不过所处的阶段和发展程度不同而已。就原始社会而言，它也存在着社会组织（氏族及其酋长、部落联盟及其首领），存在狩猎、农牧渔等生产活动及由此结成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平等互助的生产关系，存在氏族和部落内外的大众交际，存在公共关系的某些特征及其构成要素。由此看来，原始社会也具有公共关系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再说中国封建社会。相对

而言，是缺乏民主和民主政治，但是，实行分封制的时代，诸侯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其次，即使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者，特别是开国君主，他们懂得民心的重要，懂得“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因而也常常是“民主”和“专制”交替使用着。第三，专制统治的封建集权国家也并非铁板一块，也存在着“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的地方；在平行机构与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之间，专制国家与邻国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依然存在程度不同的平等互惠的往来。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并非没有公共关系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政治条件及其它条件。

从生产经营与商品交换的角度上看，到了夏、商、西周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工具主要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和木制农具。殷商、西周都是实行分封制，从诸侯王到大夫，后来成了各级领主。西周时，封建制度开始形成。虽然奴隶仍然很多，但由于释放了一部分奴隶，使他们成为半自由的可拥有生产工具和部分产品的农奴，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东周时期，由于铁器在农业上的广泛使用，“公田制”代之以“税亩制”，大大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诸侯国间的广泛发展。春秋中叶以后，一切器物都变得精巧玲珑，体质轻便，花纹工细、镌刻的铭辞韵文，字体优美，诸侯卿大夫不满足于本国的产品的享受，也促成了各国间商品交换的扩大。大商贾交通王侯卿相，参与政事，分享政权。出现了郑国弦高那样的大商人，绝非偶然。周幽王时，工商业者，日趋富豪。因此，贵族也想做买卖，谋取暴利。王叔郑桓公知道周快灭亡，同商人订立互助盟约，请商人帮助他建立新郑国。商业交换，需要货币。西周出现了铜贝、铜钱，东周又有铜币和铜刀。作为货币的铜钱流通渐广。《墨子·号令》篇说：人民守城有功，女子赐钱五千，老小赐钱一千。货币的发展反映了农工商的发展。这是那时期公共关系和分共语言发展的经济条件。

从政治的角度上看，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确实是以专制集权制度为特征的。尽管如此，但在不同的王朝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公共关系仍有发生和发展的条件。如，周初，统治阶级鉴于夏商的灭亡，政治上比较开明，奉行天子“保民”的思想。武王在《泰誓》篇里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民心看作天意，所以民心是政治好坏的镜子，开明政治是当时公共关系和公关语言发展的政治条件。《尚书》里保存不少西周的政治文诰，其中《无逸》说，治民“要怀保小民，惠（加惠于）鲜（穷人）鳏寡”；治民要“先知稼穡之艰难”，所以，周公训戒成王说：文王勤俭，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到田地上劳作，藉以知道农夫的辛苦（《尚书·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正因为如此，孔子比较夏商周制度，说周朝制度最文明，愿意从周制，提出学“文武之道”（《论语·子张》）。子贡曰：“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

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开明的君主深知：得民心者有天下，失民心者亡天下。为了巩固统治，维护其利益，贤明的君主，也会崇尚“民本”思想。在社会活动和舆论中，也总要打着爱民、保民，“为民请命”的旗号。《诗经·民劳》的例子即如此。战国时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文王、武王与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能不承认，这种思想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和进步意义。可以说：“民本”思想早在西周、春秋时期就已成了公关活动中一种很重要的舆论倾向。民心和民意已被贤明的统治者所普遍重视，被看成决定改革成败，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春秋时，郑国的子产执政 23 年，实行改革，重视听取人民意见，深得民心。《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了“子产不毁乡校”一事。“乡校”是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劳动之余，人们便聚集到乡校来，自发议论当权者政策、措施的好坏，公开批评朝政。郑大夫然明向子产建议：“毁乡

校何如？”子产说：“（人）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行忠行善）以损怨，不闻作威（滥用惩罚）以防怨。岂不遽止（对人们的议论难道不能很快制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能）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子产非常重视百姓的意见，把它看成是医治时政弊端的良药，把乡校看成是执政者与民众互相沟通及信息反馈的场所，所以他反对毁乡校。子产为政、改革的成功，有多种原因，其中与致力推行民主政治和善于运用公关语言手段调协关系，从而达到内部沟通和谐是有关系的。

从文化发展上看，汉字在五千年前就产生了。

大众交际的书面语是随着文字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据专家考证，黄帝族的文化遗址，也就是仰韶文化所在地。“仰韶文化在当时是较高的文化。”“后来黄帝族发明象形文字，借它作小筮符号。”（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54年，在西安发掘的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上的图形（象形文字）和刻划符号就是原始的汉字。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说：“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多年左右。我认为，这也是汉字发展的历史。”1985年初夏，陕西考古队在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一带勘探镐京城准确位置时，从发现的兽骨、兽牙、骨笄上清理出十多个甲骨文。考古工作者（郑洪春、穆海亭）认为，中国人使用文字的历史至少应追溯到4500—5000年以前，因甲骨文已不是原始文字，而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了。语言先于文字而存在（一百万年以前就产生了）。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脱离蒙昧史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如果说文字或书面语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晚期，那么说公关语言中的书面语至迟也当起源于那个时期也是可能的，只是当时的原始材料未能保存至今罢了。现在能看到的是早期古籍中根据传说所记载的那个时期的某些片言只语。如禹做大酋长时，对苗族战争，《墨子·兼爱》就记

载了禹伐苗的誓辞：

济济有众，咸听朕言：  
非惟小子，敢行称(举)乱，  
蠹兹有苗，用天之罚。  
若予既率尔群(众)封(邦)诸君，以征有苗。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听我讲话：不是我喜欢打仗，是那苗族前来攻掠，我现在率领你们众邦君长，去惩罚他们。”这种战争誓辞，就是战前对士兵的动员令，无疑就是军事上的公关用语。

中国的古代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文学、音乐、艺术、医药、天文、历法、历史等学科，在商代都已奠定了基础。大众交际中，书面语体同口语语体一样，成了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殷商春秋这个时期传下来的文化典籍，如《周易》、《尚书》、《诗经》、《论语》等等，保存了许多文化珍品，有文学的、史学的、修辞学的、语言学的（含公关语言），珍珠瑰宝，琳琅满目。这是上古时代公共关系、公关语言发展的文化条件。

既然公共关系意识及其实践活动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客观存在，那么，与之相生相成的公关语言，在我国上古社会也就自然地伴随着公共关系的实践活动相应地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礼记·礼运》“大同”篇写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意思是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公共的。选举贤明有才能的人（当首领），讲求信用，使人人和睦。”这里讲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事。要选拔、举荐贤能，协调关系，沟通各部落和各氏族成员之间的思想和感情，达到人和人融洽、和睦，没有公关语言作媒介显然是不行的。当然那时的公关活动不全是有计划的、普遍地、广泛地进行，公关语言也不会呈现完全形式，信息传播方式也是落后的，这个时期的公共关系与公关语言是处在原始低级阶段的萌芽时期。

从古藉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公关语言形式随着公关活动的广泛开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除口语（不明）之外，有铜器铭文，如《师旅鼎》；有铁鼎上铸刑律布告于众的，如郑简公十二年（前 554），子产为卿，所“刑书”（法律条文）铸在铁鼎上公布；公元前 613 年，晋国起兵筑城，令士兵铸成鼎和刑鼎，鼎上宣布范宣子的法律条文。对外有外交辞令，如孔子说：“为命（起草外交辞令），裨谌（郑大夫）草创之，世叔（郑大夫）讨论之，行人（外交官）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对内有诰令，如《周书·大诰》：“（成王）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功（把文、武受天命而创业的功绩布告于天下，戒勉后人不要把前人的大功忘掉）。”；有天子对臣民的训戒、慰问等等。如《尚书·盘庚》三篇，记载盘庚要迁都到殷，遭臣下反对，他便召臣下到王庭训话，其一是对众人的劝告，……其三是到殷以后对众人的慰劳。

春秋时代，诗歌、乐曲，也成了沟通上下和内外关系的一种公关语言形式。《左传》《国语》记载春秋时代外交上赋诗的事很多，有时只是应酬，有时则完全借诗句办交涉。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郑君和鲁君会于榧地，郑君这时要和晋国修好，希望鲁君为他到晋国去说情。宴会上郑大夫子家赋《小雅·鸿雁》诗，取第一章侯伯哀恤孤寡之意，暗示需要鲁国哀恤，代郑去晋交涉。鲁大夫文子答赋的诗是《小雅·四月》，取诗首章行役过期、思归祭祀的意思，表示拒绝。子家又赋《鄘风·载驰》诗第四章，取其小国有急难，盼大国援助的意思。接着季文子又答赋《小雅·采薇》诗第四章，取诗句“岂敢定居”之意，表示同意为郑国奔走。这一场外交活动双方全借赋诗示意。用诗歌形式沟通天子与诸侯以及君臣、君民上下关系，达到内部的协调统一，是上古公关语言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

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这是有关用语言形式作媒介沟通君民上下关系的明证。

春秋是多事之秋，战争频仍。《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围绕着战与和，称霸和反称霸，诸侯国之间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左传》记载的《齐桓公伐楚盟屈完》（僖公四年），《宫子奇谏假道》（僖公五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国语》上的《祭公谏征犬戎》、《诸稽郢行成于吴》等等，就是那个时代的公关语言的珍品。

总之，从商至春秋，公共关系、公关语言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事业的发展而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虽然尚属于初级水平，但那时的公共关系也已初具一般公共关系的特征和要素，公关语言也已具备了后来公关语言的完全形式，且传播方式也趋于多样化，并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公众交际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属于先秦公关史和公关语言史的发展阶段。

公元前403年，以三家分晋为标志，中国的古代社会进入了兼并剧烈的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取代了领主，夺得了政权。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农奴变为农民，铸铁技术的提高，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牛犁、深耕、施肥、灌溉等农田技术的推广，使战国时代的农业进入了一个跃进时期。手工业分工细密，技术日精。由于铁耕盛行，钢铁兵器需要量大，冶炼行业中出现了大批富豪，有的富致巨万，富比国王（如邯郸郭纵、鲁国丙氏）。当时黄金、白银成了通行的货币，商贾私家可以铸钱。不少经商致富的巨商大贾可以执掌政权，左右局势。《韩非子·亡征》篇说，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大商人吕不韦，因巨富实力雄厚，当上了秦国的宰相，秦始皇封他洛阳十万户，占有奴隶一万人，垄断了洛阳的工商业。由于商业兴盛，战国时出现了一批大商业城市（如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洛阳等）。中等的都市称为“有市之邑”。韩是当时最小的诸

侯国，然而仅上党地区，就有七十邑有市，至于小邑小市就比比皆是。尽管商鞅在秦变法，重农抑商，《韩非子·五蠹》也指斥工商为祸国的五种蛀虫之一，可是“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货殖列传》），人们倾心工商的风俗已难于改变。荀子看到通商的重要，主张“四海之内若一家”。内外交易，互利互惠，都可以得到好处，何乐而不为？农工商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和学术文化的繁荣，给学术上的大一统思想、内外公关的频繁活动和秦的扩张统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农家、名家、杂家、纵横家、三教九流各种学派空前活跃；学术上诸子百家的争鸣、外交上的频繁活动和政治上、军事上剧烈的兼并战争是同步进行的。公共关系、公关语言在这样繁盛、复杂、动荡、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发展以至于成熟，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出于内政外交和各自发展的需要，各诸侯国的贵族，养士之风盛行。据《史记》记载，当时著名的养士的贵族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这四人养士多的在三千人以上，这是由公关先生组成的庞大高层次的前所未有的公关大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在经济文化领域，还是政治外交领域，士成了社会上最活跃的一种人。尽管士的成分比较复杂，有学士（如儒、墨、道、法、名、农等专门家），策士（以纵横家等说客为主要代表），有方士或术士（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专家，阴阳、卜筮、神仙等游客），还有一类是食客。他们中确有一部分是混饭吃的；但多数人是在政治、经济、外交上有作为、文化上有贡献的知识界人士。其中的策士说客，一部分学士（孟子、墨子、韩非子等）还有一些文臣武将，在内外社交中，实际上起到了高档次的专业公关人员的作用。除了苏秦、张仪、桓团、施惠、公孙龙这些善辩之士外，诸如齐国高士、反对赵王尊秦王为帝的鲁仲连；自荐使楚，说服楚王救赵的平原君食客毛遂；说服赵太后将爱子作

人质换取齐国援兵的忠臣触龙；富有辩才，讽谏齐王广开言路的相国邹忌；有勇有谋，终于完璧归赵的宦官缪贤的门客蔺相如；上书劝谏，终使秦王取消“逐客令”的李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辱使命，义正辞严怒对秦王的安陵国的唐雎；善于抓住对方心理、巧说秦王采纳自己主张的魏人范雎；不慕名利、不畏权势、幽默风趣的齐隐士颜斶；擅长设喻从而巧妙说服楚王放弃攻宋的思想家墨子；说服梁惠王、齐宣王实行“王道”、推恩安民以论辩著称的孟子等等。他们多是战国时一些富有正义感、刚正不阿、能言善辩、讲求语言交际技巧的有胆有识之士。他们的行为在战国时代的公共关系活动中是有影响的，他们的很多说辞、著述也不失为那个时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关言语成品。更为可贵的是，当时已经出现了像鬼谷子那样的言语运用学导师（《史记·张仪传》：“（张仪）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学纵横捭阖之术）”，同时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公关语言方面的理论著述，如《鬼谷子》、《韩非子·说难》、《荀子·非相》以及《孟子》中的某些片断，理论虽然还不完善，但已经涉及到公关语言领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基本形成了公关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例如：

### （一）语言的形式要服从思想内容。

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上》）是说不要因为追求文采而妨碍准确的措辞；也不要因为讲究措辞而妨碍思想内容的表达，形式要为内容服务。

### （二）关于“善说”的技巧、要求与效用。

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意思是：言语浅近，意义却深远的，这是善言，所操持的（论断）简约，效果却广大的，这是“善道”。君子的言语，讲的虽是常见的事情，可是“道”就在其中，君子的操守，从修身开始，（然后去